

## 第二章 匈奴的起源與發展

### 第一節 匈奴的地理環境及生計類型

#### 一、自然環境及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人類學家幾一致肯定生活空間決定生計類型；因此，我們探討匈漢關係時，應慮及不同生計類型所孕育出的文化差異，而不宜逕以農業文化之觀點作為比較基準。<sup>1</sup>

匈奴人處於北方草原地帶，氣候嚴寒，雨量稀少，因而無法種植穀物；與居於陰山山脈以南，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華夏族系，兩者之社會文化迥然不同。由此可見，生存空間對生計類型（即文化模式）影響之鉅。

匈奴本部，從地理上來看，自成一個單位或地區，可以說是蒙古高原中的一個大盆地，周圍多有山嶺為屏障：東有興安嶺，東北有肯特山，南邊有陰山、賀蘭山，西邊是阿爾泰山，西北是唐努山。唐努山略趨東西走向，然後折向西南，延長為杭愛山脈，杭愛山脈隆起在蒙古高原的西北部。

匈奴強盛時曾東破東胡，南併樓煩、河南王地，西擊月氏與西域諸國，北服丁零與西北的堅昆。東胡所居的地方應該是現在的內蒙東部大興安嶺一帶。樓煩、河南應該是現在山西北部與陝西北部。月氏原在河西走廊，這就是現在甘肅的武威、張掖、酒泉一帶。此外匈奴還控制了現在的新疆，勢力一直伸張到烏孫、大宛或蔥嶺以西的大夏、康居等地，也就是現在的中亞的鹹海、黑海一帶，往北到現在的貝加爾湖一帶。<sup>2</sup>

關於匈奴人的生活文化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曰：

「匈奴 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駃、騊駼、騂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

<sup>1</sup> 詳見本論文頁 4-5。

<sup>2</sup> 陳序經《匈奴史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 54。

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毋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已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妻妻之。其俗，有名不為諱而無姓字。」<sup>3</sup>

其實，司馬遷對於匈奴「苟利所在，不知禮義」的看法犯了邏輯上所謂異類不比的錯誤。他忽略了不同空間孕育出不同文化類型，而以漢人的觀點去評斷草原民族。他認為匈奴「不知禮義」並不正確，因為草原文化自有其禮義標準。簡言之，司馬遷的看法忽略了文化的多樣性和相對論。<sup>4</sup>

《漢書 匈奴傳》言道：「(匈奴)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sup>5</sup>《鹽鐵論 備胡》曰：「衣皮蒙毛，食肉飲血」<sup>6</sup>。游牧民族主要依靠馬、牛、羊三種畜類維生。在這三種之中，又以馬為最重要。馬的種類很多，奇特的也有多種。《鹽鐵論 崇禮篇》說：「騾驢駱駝，北狄之常畜也。」<sup>7</sup>匈奴馬的數量也多；除了作為攻伐之用外，當還有許多不為騎兵所用的馬。在匈奴，騎兵是攻戰的主要力量，騎兵往來快捷，出沒無常。戰國時代，中原民族往往飽受匈奴騎兵之侵擾。《漢書 匈奴傳》載有「匈奴之俗 以馬上戰鬥為國。」<sup>8</sup>《東觀漢記》曰：「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鬥駱駝以為樂事。」<sup>9</sup>《後漢書 南匈奴傳》也說：「匈奴俗，歲有三龍祠， 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sup>10</sup>

這些史料顯見匈奴是一個注重狩獵與畜牧的民族。匈奴單于自頭曼、冒頓以來，對狩獵都很重視。匈奴人射獵，不只以射鳥獸為食或娛樂，而且以之作為一種軍事訓練，一種嚴格紀律的手段。所以匈奴人從小就練習射獵，在羊背上射，在馬背上射，這樣的長期訓練，嚴格遵守紀律，嚴格執行命令，是冒頓之所以能東敗東胡，西擊月氏而建立一個大帝國的重要原因。同時匈奴的射獵，往往也是軍事上的行動。《漢書 匈奴傳》曰：「數萬騎南旁塞獵，行功塞外亭(障)，略

<sup>3</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台北：天工書局，1985 年)，頁 2879。

<sup>4</sup> 詳見本論文頁 8-9。

<sup>5</sup>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台北：世界書局，1972 年)，頁 3834。

<sup>6</sup> 盧烈紅注譯《鹽鐵論 備胡》，(台北：三民書局，1995)，頁 513。

<sup>7</sup> 盧烈紅注譯《鹽鐵論 崇禮篇》，頁 503。

<sup>8</sup>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頁 3797。

<sup>9</sup> 劉珍《東觀漢記》(京都：中文出版社，1969 年)，頁 205。

<sup>10</sup>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傳》卷 89，(台北：世界書局，1972 年)，頁 2944。

取吏民去。」<sup>11</sup>

馬肉、乳可作食品，馬乳還可以作酪。在匈奴人的食品中，牛羊肉、乳尤為普遍。《史記 匈奴列傳》載：「中行說對漢使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sup>12</sup>匈奴人日常烹殺牛羊，食其肉，而用其骨作器皿或工具。如《鹽鐵論 論功》篇記載匈奴人用素孤骨鏃。關於胡人食肉之法，漢代劉熙在《釋名 釋飲食》中有描述：「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sup>13</sup>即將一整畜用火烤熟，族人再用刀分割而食。

按史籍的記載，漢代時，匈奴貴族中就有飲酒的嗜好。賈誼《新書 匈奴篇》就有「以匈奴之飢 多飲酒」語。<sup>14</sup>老上單于（公元前一七四 - 前一六一）破月氏後，曾以月氏王頭為飲器。<sup>15</sup>匈奴人還將牲畜乳汁作成鮮美的乳漿飲食，他們稱之為「湏酪」。為適應游牧轉徙生活和顧及儲存攜帶之便，他們又將乳汁精煉而成乾酪，其人謂之「鼎蠡」。湏酪、鼎蠡是其生活之備。所以《漢書 楊雄傳》記漢兵至匈奴王庭，曾「燒鼎蠡」，為的是「壞其養生之具」。可見，湏酪、鼎蠡等是匈奴人須臾不可缺乏之飲食品。

由於匈奴居住的地區寒冷，故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而漸變成首飾的冠飾。《後漢書 輿服志下》引：「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云。」<sup>16</sup>說明附蟬為文，貂尾為飾，確出胡俗，故光武帝以賜匈奴單于。

賈誼在《新書 匈奴篇》曰：「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于胡嬰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親，為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會，時以賜之。」<sup>17</sup>據《史記 匈奴列傳》載<sup>18</sup>，西元前一七四年，孝文皇帝曾遣匈奴單于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

游牧的匈奴，為騎馬、涉草之便，穿的則是名曰胡履的靴子。《隋書 禮儀志》：「靴，胡履也，取便於事，施於戎服。」<sup>19</sup>所有這些，指的都是草原騎馬民族所穿的靴子。

<sup>11</sup>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上，頁 3784。

<sup>12</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900。

<sup>13</sup> 劉熙《釋名 釋飲食》，（台北：廣文書局，1971 年），頁 31。

<sup>14</sup> 饒東源，黃沛榮《新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196。

<sup>15</sup> 司馬遷《史記 大宛列傳》卷 123，頁 3157。

<sup>16</sup> 范曄《後漢書 輿服志》，志 30 下，頁 3668。

<sup>17</sup> 饒東源，黃沛榮《新書讀本》，頁 189。

<sup>18</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7。

<sup>19</sup> 魏徵《隋書 禮儀志》卷 12 志 7，（台北：鼎文書局，1979-1980 年），頁 276。

牛、馬、羊等牲畜之皮，匈奴人將其揉裝成革，進而做成衣褲稱為「革笥」的鎧甲。獵獲的羊和狐、貂等毛皮則加工作成輕軟的「裘」。《後漢書 南匈奴傳》記載北匈奴曾向漢朝「貢馬及裘」。《史記 匈奴列傳》言匈奴人「衣其革，被旃裘」。匈奴人很早就用畜皮裝作褲子、長靴、長袍、尖帽或風帽，這種服飾，無論在行動或保暖方面，都很適應馬背上的生活。戰國時代趙武靈王所採用的胡服，就是這種服裝。

匈奴人住的地方叫做穹廬，是氈帳幕。這種房舍，需用木條作樑柱。搭造穹廬所需木材不多，較輕便，易搬遷。穹廬不很大，一般五口之家活動上便略顯擁擠。這種居住條件是漢人所不習慣的；正如嫁給烏孫昆莫的江都王建女所作的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sup>20</sup>

《史記 匈奴列傳》曰：「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sup>21</sup>匈奴「妻後母、報寡嫂」的習俗，延續的時間很長，直到公元四世紀初仍有可見。不只匈奴有收繼婚習俗，當時北方不少遊牧民族都有這種習俗。如烏孫人亦「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sup>22</sup>烏桓人亦「妻後母，報寡嫂。」<sup>23</sup>後來的柔然、突厥皆有此習俗。

游牧民族之所以盛行這種習俗，是因為：首先它可以起著一種維繫某種政治關係的作用。如細君公主為烏孫昆莫之右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陁遂妻公主」。<sup>24</sup>她從胡俗後，便將漢與烏孫之間的友好關係繼承維繫下來。其次就本族而言，這種習俗可以使宗種延續，穩定血緣關係，並以此調節貴族氏族間的矛盾。<sup>25</sup>

研究匈奴宗教信仰的主要材料是《史記》、《漢書》與《後漢書》中零碎片斷的記載。《史記 匈奴列傳》：「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sup>26</sup>《漢書》照抄了這段話，只是龍城作龍城。《後漢書 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

<sup>20</sup> 班固《漢書 西域傳》，卷 96 下，頁 3903。

<sup>21</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79。

<sup>22</sup> 范曄《後漢書 西羌傳》卷 87，頁 1026。

<sup>23</sup> 范曄《後漢書 烏桓鮮卑列傳》卷 90，頁 1071。

<sup>24</sup> 班固《漢書 西域傳》卷 96 下，頁 3904。

<sup>25</sup> 張碧波《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3。

<sup>26</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2。

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sup>27</sup>又《史記 匈奴列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sup>28</sup>，「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sup>29</sup>。有說：「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sup>30</sup>

匈奴拜日月是每天都要舉行的，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俗，與每年三次集會不同。由此，可以看出，匈奴有定期的集體拜祭，宗教意識在匈奴人的生活中的確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 二、經濟活動

生活在草原上的匈奴人，自從他們的緣洲農業被沙漠所掩沒，或者被無情的氣候所侵蝕以後，就轉向以牲畜來作他們的生活寄託；以游牧制度來維持他們的社會生命。把一切都寄託在那「綠意蔥蘢」的草原上；「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sup>31</sup>在一批一批的「飛禽走獸」之上建立起他們的食衣住行。整個社會的人民，無論男女老幼，都「隨水草畜牧而轉移」；在有草的地方停下來，草光了再走。不走不行，因為任何一塊草地都禁不起成年累月的放牧。

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畜群就是人民的生命線。資本家是「馬畜瀾山」，富貴如此。窮人也得設法「儲畜」一些足夠食的牲口。但一旦遭遇到不可避免的天災人禍，人民便只有走向死路。如建武二十二年（西元四六年）：「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sup>32</sup>這是一個多麼悲慘而沉痛的例子。

這種草原的游牧經濟是怎麼形成的呢？按照俄國歷史家弗拉狄米兒佐夫（名Vladimirtsov）的意見，以為西伯利亞，烏梁海及阿爾泰邊緣的北蒙古族群的起源，是森林狩獵居民。在西伯利亞阿爾泰的巴昔里克所發現的遺物，可以很有力地證明森林中以狩獵為生，並利用北地鹿運輸的居民，可以在草原邊緣上把放牧北地鹿改為大量地放牧其他的動物，使他們自己轉變為真正游牧民族。<sup>33</sup>匈奴人雖以畜牧為其主要的生產力，卻也還存有狩獵經濟的性質。

《史記 匈奴列傳》中有如此之敘述：「其（匈奴）俗，寬則隨畜，因射獵

<sup>27</sup>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傳》卷 89，頁 2944。

<sup>28</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908。

<sup>29</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908。

<sup>30</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2。

<sup>31</sup> 盧烈紅注譯《鹽鐵論 論功篇》，頁 657。

<sup>32</sup>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89，頁 2942。

<sup>33</sup> 凌純聲《邊疆文化論集》冊二（台北：中華文化出版社，1954年），頁 145。

禽獸為生業」<sup>34</sup>，「（周）穆王伐犬戎，得四百狼四百鹿以歸。」<sup>35</sup>《漢書 韓安國傳》說：「匈奴，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sup>36</sup>這些例子都說明狩獵在草原社會經濟上的重要性。而且從射獵的過程中還可以鍛鍊少年人甚至成年人的戰術。

適應於這種環境的生產技術，自然不需要很高明，也不可能高明的。<sup>37</sup>《史記 匈奴列傳》曰：「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騃、騊駼、騂騊。」<sup>38</sup>畜類需要的是草和草場，所以游牧民族也許知道如何去保護畜類，利用土地和積蓄草料等，但史無明文，也就無法推測。

在游牧社會，主要的勞動力依然是人；放牧射獵需要人，整理草場更需要人。牲畜主要作為運輸之用，不太可能作生產工具。他們重要的生產工具是兵器。靠射獵為業的人，使用兵器是很平常的事，因而匈奴人「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柑弦掌拊；秋收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殆仆。」<sup>39</sup>

由此，不管是畜牧，還是狩獵，匈奴人的經濟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且，尚沒有完全擺脫原始的採集經濟的情景。

古代史書多說匈奴人不事耕種，《史記》說匈奴人「毋耕田之業」。《鹽鐵論 備胡》說：「外無田疇之積」。<sup>40</sup>《鹽鐵論 論功》說：「馬不粟食」。<sup>41</sup>不過《漢書》引用司馬遷的「毋耕田之業」一語，又說到李廣利被匈奴人殺死之後，「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sup>42</sup>這說明匈奴是有耕田之業的。《漢書 西域傳》載：嫁到烏孫的楚解憂公主曾上書信「匈奴發騎田車師」<sup>43</sup>，這很像漢人的屯田作法。

近來發掘的匈奴墓中有鐵質的鐮與鐮刀，有石臼，說明匈奴有農業生產活動

因為生產上所需要的東西，尤其是統治者需要的奢侈品，匈奴人不能完全自給，必須從其他地方輸入，所以匈奴人十分重視商業交換。《史記 貨殖列傳》載：「烏氏裸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獲戎王。戎王甚倍其償，與之畜，

<sup>34</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79。

<sup>35</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81。

<sup>36</sup> 班固《漢書 竇田灌韓傳》卷 52，頁 2401。

<sup>37</sup> 凌純聲《邊疆文化論集》冊二，頁 147。

<sup>38</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79。

<sup>39</sup> 凌純聲《邊疆文化論集》冊二，頁 147。

<sup>40</sup> 盧烈紅注譯《鹽鐵論 備胡論篇》，頁 518。

<sup>41</sup> 盧烈紅注譯《鹽鐵論 備胡論篇》，頁 656。

<sup>42</sup>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上，頁 3781。

<sup>43</sup> 班固《漢書 西域傳》卷 96 下，頁 3905。

畜至用谷量馬牛。」<sup>44</sup>游牧部落用以為交換的主要物品是牲畜，他用價值十倍的牲畜去交換；「奇繒物」在游牧社會中是一種奢侈品。

匈奴在手工業方面，自己製造的手工業品，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和戰爭用品。首先是獸毛皮鞋製品。衣服、馬褂、長靴、尖帽、風帽等穿著物品，穹廬的牆壁、地毯、毛氈等，此類物品除自用外，還可作商品或禮物。《後漢書 南匈奴傳》說：「二十八年（公元五十二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sup>45</sup>其次是木製品。穹廬用的柱梁，馬鞍，車。匈奴車相當多。《後漢書》指出：東漢安帝永初三年（西元一 九年），耿夔擊敗南單于，「獲穹廬車重千餘兩」<sup>46</sup>，可見其車之多。《漢書 晁錯傳》載有：「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sup>47</sup>匈奴人還用木作橋。《漢書 匈奴傳》說：「北橋余吾，令可度，以備奔走」。<sup>48</sup>匈奴人還用木做棺材。《史記 匈奴列傳》說：「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葬服」。<sup>49</sup>

匈奴人也用各種陶器。《漢書 蘇武傳》說單于之弟於靛王賜蘇服匿。匈奴沒有文字，王子良所得的古器是有字的，有可能是仿制漢人的東西。在蒙古高原匈奴人的墓中掘出很多古物，包括陶器、銅器、鐵器、銀器與金器。其中有生活必需品，軍用品與裝飾品。不過，從出土的古物看來，我們只能說是匈奴人使用的手工業品，其中有的是漢朝給予匈奴的，有的是匈奴從漢族或其他各族掠奪而來的，也有的是匈奴用交換方式得來的，不一定是匈奴製造的。

### 三、政治制度

適合於游牧經濟社會的統治，自然是「中央的軍事集權」為佳。利用軍事的紐帶才可以把沒有定居的各氏族的血緣關係拉得更緊。為了統治上的便利，單于把全國的領土劃分為三大塊，自己居中，管理其直轄領地；左右諸王將及其諸侯們分別治理其左右兩方面的屬地。

單于是中央政府政治和軍事上的神經中樞。輔佐他處理公務的有異姓的左右骨都侯，世襲的官史，如蘭氏，呼衍氏，須卜氏等，以及其他各種經常的和臨時的中下級公務人員，他們為單于管理內政、外交、財政、起草法律、審判罪犯和

<sup>44</sup> 司馬遷《史記 貨殖列傳》卷 69，頁 3260。

<sup>45</sup>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傳》卷 89，頁 2946。

<sup>46</sup> 班固《漢書 耿弇列傳》卷 19，頁 719。

<sup>47</sup> 班固《漢書 爰盎晁錯傳》卷 49，頁 2281。

<sup>48</sup>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頁 3783。

<sup>49</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2。

一切政務上的事件。

地方政權以「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為最大國」，較次的有「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當戶。」這些都是單于直屬下各地的政治軍事上的首腦，一方面用以傳達單于的政令，他方面也是藉以鎮壓殖民地人民的叛亂。

關於匈奴人的政治制度，《史記 匈奴列傳》曰：

「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sup>50</sup>

後漢書記匈奴之官制曰：

「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吳文書簿領焉。」<sup>51</sup>

由上表可知匈奴採軍政合一制，其政治組織分為中、左、右三部；單于居中，

<sup>50</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0-2891。

<sup>51</sup>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79，頁 2944-2945。



次為嗣君左賢王，因匈奴以左為貴。與單于同姓貴族皆有封地且擁兵，故居外，異姓貴人則無封地，故居中。漢並不採此種模式，漢書卷三十六劉歆傳「宗室不得過三河」之記載可知。

## 第二節 匈奴的起源

### 一、匈奴的族稱

「匈奴」這個族稱，歷史上，何時開始被採用？

《史記 匈奴列傳》載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sup>52</sup>，「三國邊於匈奴。」<sup>53</sup>，「匈奴不敢入趙邊。」<sup>54</sup>，「匈奴單于曰頭曼」<sup>55</sup>，「匈奴得寬」<sup>56</sup>，「匈奴寶馬也」<sup>57</sup>，「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sup>58</sup>，「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sup>59</sup>。

王國維先生於其所撰《鬼方昆夷獯狁考》一文中提到：

「此族見於最古之書者，實為鬼方；《易》既濟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爻辭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詩》大雅蕩之篇曰：『覃及鬼方』《易》之爻辭，蓋作於商周之際；大雅蕩之篇，作於周厲王之世，而託為文王斥殷紂之言。蓋亦謂殷時已有此族矣。後人於《易》見鬼方之克需以三

<sup>52</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79。

<sup>53</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86。

<sup>54</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86。

<sup>55</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87。

<sup>56</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87。

<sup>57</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89。

<sup>58</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0。

<sup>59</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0。

年，知其為強國；於《詩》見鬼方與中國對舉，知其為遠方，然皆不能質言其地。」<sup>60</sup>

根據大陸學者陳序經的看法，《戰國策 燕策 燕太子丹質於秦》可能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的記載；茲引述其原文如下：

「我在《戰國策 燕策 燕太子丹質於秦》裏找到匈奴這個詞，而且連用二次。其文云：

樊將軍（於期）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太子丹曰：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

這是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二二七年）的事情，上距秦之統一天下七年，是目前我所能找到的匈奴這個名詞之最早見於著作者。《戰國策》為前漢劉向集先秦人所記戰國時事之書。劉向是宣、元時代人。雖然有人對這部書所記的事情也有懷疑的地方，但在劉向之前的司馬遷作《史記》時已多採其文，所以我們對於匈奴這個名詞最早見於上面所錄的那段話似不應有所懷疑。」

61

陳序經氏認定《戰國策》之成書年代為漢宣、元帝時期而主張《戰國策 燕策 燕太子丹質於秦》為史上最早的記載。然而《戰國策》的作者劉向雖為西漢人，但究竟何時成書仍無明確佐證；<sup>62</sup>不如司馬遷之《史記》成書年代<sup>63</sup>信而有徵。因此，歷史上匈奴一詞之最早見於著作，而經多數學者公認

<sup>60</sup> 王國維《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篇（二） 鬼方昆夷獫狁考，（台北：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頁582。

<sup>61</sup>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101-102。

<sup>62</sup> 張其昀《中華百科全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1-1983年），頁5205：「戰國策，原係若干史料性之作品，乃由數批不同材料、不同作者、不同年代與地域，各以不同觀點寫成。本非一完整之書，至西漢末年，劉向始將其加以整理，合編為一。」

<sup>63</sup> 《中國大百科全書》，（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1980年），頁937：「元風三年（西元前

者，為《史記 匈奴列傳》。

在採用「匈奴」一詞之前，其族的族稱為何？學者意見不一，究其主要原因，一則記載缺乏，文獻資料稀少；一則頭緒紛紜，上古民族名稱繁多，不足以作為有力之考證。

《詩經》中若干篇章如「定之方中」、「載馳」、「六月」、「出車」、「采薇」等篇。例如：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sup>64</sup>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烏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sup>65</sup>

最早而有系統的匈奴研究材料，當屬司馬遷的《史記 匈奴列傳》。然而，直至秦代，匈奴的通用名稱仍是「胡」。秦始皇時有「亡秦者胡」的傳說，秦始皇遂派大將蒙恬伐胡，並修築長城。可見當時通用的名稱是「胡」而不是「匈奴」。司馬遷寫作《史記 匈奴列傳》時，「匈奴」這個名詞已普遍通用。司馬遷之前，賈誼（賈誼卒於公元前一百六十八年，而司馬遷是在二十三年後出生的）的《新書》裡已見關於匈奴的記載。<sup>66</sup>賈誼關於匈奴的記載都是討論對付匈奴的對策。在歷史上，最先對匈奴之名稱問題提出解答的是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文中曰：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sup>67</sup>

如此說來，匈奴的祖先，是出自夏后氏的苗裔，而與漢族同出一源；據此推論，則山戎、獫狁、葷粥等族亦出於華夏族。另一方面經籍中常將「諸夏」與「夷

---

一 八年），司馬遷繼任父職，在太初元年（西元前一 四年）參加制定《太初曆》後，開始撰寫《史記》。經十餘年努力，終於成書。」

<sup>64</sup> 宋海屏 譯《詩經新譯》（台北：人文書局，1972年），頁16-17。

<sup>65</sup> 宋海屏 譯《詩經新譯》，頁16-17。

<sup>66</sup> 饒東原，黃沛榮《新書讀本 匈奴》，頁181-199。

<sup>67</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110，頁2879。

狄」相對稱，匈奴又顯然是華夏或諸夏以外之異族。因此，匈奴的先世是夏后氏的後裔一說，由於其他典籍上未見疑似記載，似應存疑。

王國維於其所寫 鬼方混夷獯豷考 一文中稱：

「我國古時有一彊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入侵暴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加之；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豷。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獯豷。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綜上諸稱觀之，則曰戎曰狄者，皆中國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豷曰獯豷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為中國所附加。當中國呼之為戎狄之時，彼之自稱決非如此，其居邊裔者，尤當仍其故號，故戰國時中國戎狄既盡，強國辟土，與邊裔接，乃復以其本名呼之。此族春秋以降之事，載籍稍具，而遠古之事，則頗茫然，學者但知其名而已。」<sup>68</sup>

如上所述，王國維將中國上古北方邊裔諸民族的名稱，詳加考證並將之系統化。我們可據此將上古邊裔諸族之繁多名稱簡化而加以歸類：鬼方亦作鬼戎，混夷亦作昆戎、混戎、緄戎、犬戎、吠戎、串戎；獯豷亦作獯豷、熏育、葷粥，獯粥，又作獯育、獯豷，其見於古器物方面者，如 ， 等。

王國維氏提出戎狄等詞，係中原民族所加之名，台灣學者劉學鈔亦認為任何民族絕無自甘以醜字為自身名稱之理，因此無論為夷、戎、狄或匈奴之「奴」，絕非其自稱，更何況此等醜字又係他族之文字。中國歷史，於敵對者，每喜以醜名加之，遠者姑不贅引，近者如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中國民咸呼日本人為「倭寇」、「倭奴」；而日本侵佔台灣時，對不願順從之台灣中國人，則稱之為「清國奴」，其作此等稱呼之心態正相同。<sup>69</sup>

筆者也以為，各民族在自身名稱上不可能自貶，當時匈奴尚無文字記載，很

<sup>68</sup> 王國維（鬼方混夷獯豷考）《王國維先生全集》，頁 581-582。

<sup>69</sup> 劉學鈔《匈奴史論》，（台北：南天書局，1987年），頁 6。

有可能是漢民族在將之音譯為文時加入了自身觀感，選擇較負面的字、詞來記載。就字義看來，「奴」固然是貶抑之詞，「匈」自亦有負面意味。《史記 項羽本紀》中之「天下匈匈」<sup>70</sup>一詞，應是以「匈匈」來表達喧擾騷亂之意。究其原因，有可能是源於秦時漢初匈奴之入侵，至當時的中原民族心生厭惡，而借匈奴之「匈」字作為形容。<sup>71</sup>

劉學鈔對王國維氏古代諸族皆為匈奴之理論提出質疑：不過王國維認為古時在諸夏之北、西之民族，俱為後世之匈奴，此項認定，不無商榷餘地，蓋秦、漢之際，稱強於今中國北方者，初非匈奴，實係東胡，如《史記 匈奴列傳》載：「當時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sup>72</sup>顯見匈奴頭曼單于之時，居其東之東胡，強於匈奴，而東胡非匈奴之族，乃極明顯之事實，況且史記匈奴列傳中，載匈奴冒頓單于與東胡爭戰之事至詳，可為佐證。<sup>73</sup>

劉學鈔肯定王國維直接指稱舉凡鬼方、獯狁、獫狁、葷粥 匈奴、胡等名稱，皆為一音之轉，亦均為同種之族，亦即「胡」字一音之諸種譯讀的看法，並進一步探究，「胡」字義：按匈奴確曾自稱「胡」，如匈奴狐鹿姑單于遣漢書廷即自稱：「南有大漢，北有強奴。胡者，天之驕子也。」<sup>74</sup>狐鹿姑單于去頭曼單于已是第五代後裔，自稱「胡」者，顯見「胡」或係純然之音譯，當無醜惡或清視之意，因此近人多主張「胡」者乃匈奴語「人」之意。<sup>75</sup>

馮家昇氏關於「胡」之字義，在其所撰 匈奴民族及其文化 一文中，就土耳其蒙古通古斯語族中，尋求其語源，得如下例証：

|                  |                     |
|------------------|---------------------|
| 今土耳其語族中 Turk 語人曰 | Kun , Kunen。        |
| Woghur 語人曰       | Kum , Khum , Kum。   |
| 匈牙利語人曰           | Kun。                |
| 蒙古語族中之 Khalk 語人曰 | Kun。                |
| Kalmuk 語人曰       | Kun , Ku。           |
| Dakhur 語人曰       | Khun , Ku。          |
| Burjat 語人曰       | Khung , Kung , Kun。 |

所謂 Ku , Kun , Khun 正為「胡」之對音，其義為「人」。<sup>76</sup>

<sup>70</sup> 司馬遷《史記 項羽本紀》卷 7，頁 328。

<sup>71</sup>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 103。

<sup>72</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87。

<sup>73</sup> 劉學鈔《匈奴史論》，頁 6-7。

<sup>74</sup>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頁 3780。

<sup>75</sup> 劉學鈔《匈奴史論》，頁 7。

<sup>76</sup> 馮家昇 匈奴民族及其文化 ，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五期（台北：台灣大通書局），頁 638-639。

梁啟超於其所著《史記匈奴傳戎狄名義考》中認為：

「戎狄既為通名，不能以此分種界，於是吾輩考古之業，遂糾紛而無朕。吾乃據群籍以比推之臆斷《史記》本文所述者，凡維三族：一曰根據今山西、陝西而侵入雜居於內地者。其根據今山西陝西之族，則《史記》本文所舉十八九屬焉。其族為控弦游牧之眾，最悍盛，而蹂躪之地最廣，在黃帝時謂之獯鬻，《五帝本紀》所為黃帝北逐獯鬻是也。在堯時小謂之狄，其種之可知者八，《墨子》所謂堯北教八狄是也。……至文王時，其在西者謂之昆夷，其在北者謂之獯狁，其總稱曰吠夷，本文所謂西伯昌伐吠夷是也。……夫曰獯狁，曰吠夷，與獯鬻之獯皆從犬，故知即太王所避之狄。夫自秦以前，戎狄之名稱以百數，而未聞有匈奴。及秦而此絕強大之種族忽發現於西北者，蓋前此縱橫馳突於我中原腴沃之地，各自趨利，而又有我族諸強國間隔犄角之，故其勢莫能統一。及經春秋戰國，為我族殲擊殆盡，其存者婉轉竄於穹北苦瘠之地，蹉躑頻續，則同胞互相急難之情生，地段毗連，則雄主臂指相使之勢易。故頭曼冒頓繼起，遂能組織一大國，南向復與我族爭也。

二曰根據今甘肅而侵入雜居於內地者。曰陸渾之戎，亦稱姜戎，亦稱陰戎，亦稱允姓之戎。此族本三苗之裔，其後衍為羌族者，《史記》此文以之與諸戎狄混合為一，是大謬誤也。

三曰根據今遼東而侵入內地但未雜居者。曰山戎，亦曰東胡，即後世契丹金源滿洲之族。西語所稱為通古斯族，通古斯Tunguse者，東胡二字之音譯也。」<sup>77</sup>

<sup>77</sup> 梁啟超 史記 匈奴傳戎狄名義考 《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3426-3429。

根據上述引語梁氏認為獯鬻、昆夷、獯狁同為一族，而且因其名稱皆從「犬」，而認定其必為太王所避之狄，其詞未免失之武斷。北方邊疆民族，在上古時代，概以戎狄稱之。

對此，土耳其著名的歷史學者厄格爾氏（Bahaeddin Ogel）於一九八一年提出如下的說法：

「根據中國古代史書的記載，凡居住在中國北方的部族，皆以『胡』之名泛稱之。然而日本著名的學者百鳥庫吉在其論文中（JA，1923，80）對此問題卻採不同角度來探究：『今日有許多學者相信（冒頓所攻伐的）東胡族源於 Tunguz 種族，並據此主張該族名應寫作 Tunguz。我卻以為 Tunguz 一詞應是突厥人用以名其東邊部族之詞。由於 Tunguz 之名在突厥語對應字為 domuz（豬），突厥人遂以 Tunguz 一詞表達其輕蔑該部族之意。』其實不然，根據中國史書的記載『東胡』一詞，應作『東邊的胡族』解。東胡人，為五胡及鮮卑人之遠祖。由於東胡人居住於匈奴族東邊，而得名曰『東胡』。後來中國人將中國西邊的所有部族均冠以『胡人』之名，不過這個認知約到西元元年左右才成型。」<sup>78</sup>

但厄格爾氏八年後於其所撰《突厥神話》一書中卻附和百鳥庫吉氏的說法，主張「東胡」一詞可能是古突厥文 Tunguz 之音譯，即今日土耳其文中 domuz（豬）的意思。<sup>79</sup>

不過，訴諸土耳其語族，Tunguz 之語源時，尚無法證實 Tunguz 與 domuz 間之關連，筆者在此也只能對上述說法表示存疑。

在「匈奴」一詞成為定稱之前，採取其他名稱者，有數十種之多，茲引用馮家昇在《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一文中的敘述，整理製作成下表：<sup>80</sup>

表（一） 匈奴在中國古籍中的別名一覽表

<sup>78</sup> Bahaeddin Ogel, *Buyuk Hun Imparatorlugu Tarihi I*《匈奴大帝國史》第一冊（Ankara：Kultur Bakanligi Yayinlari, 1981），pp.87-88。

<sup>79</sup> Bahaeddin Ogel, *Turk Mitolojisi*《突厥神話》（Ankara：Turk Tarih Kurumu Basimevi, 1989），pp.4-5。

<sup>80</sup> 馮家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頁 637-638。

| 別名 | 出處或注釋            | 別名 | 出處或注釋     |
|----|------------------|----|-----------|
| 鬼方 | 易既濟爻辭            | 吠戎 | 國語        |
| 鬼戎 | 竹書紀年 - - 後漢書引    | 申夷 | 詩皇矣       |
| 方  | 梁伯戈              | 獫狁 | 詩采芣、出車    |
| 方  | 小孟鼎              | 獫允 | 呂覽審為篇高注   |
| 畏夷 | 鬼畏同，故有「無鬼」「無畏」之名 | 耘  | 夸甲盤，號季子白盤 |
| 隗國 | 左傳，漢書有隗囂，魏志有隗禧   | 允  | 不 敦       |
| 媿氏 | 包君鼎及鄧公敦          | 允  | 不 敦       |
| 混夷 | 詩大雅              | 獫狁 | 史記晉灼      |
| 混戎 | 詩                | 獫允 | 史記匈奴列傳    |
| 緄夷 | 史記匈奴列傳           | 獯鬻 | 孟子        |
| 緄戎 | 史記匈奴列傳           | 獯粥 | 應劭風俗通     |
| 昆夷 | 詩采芣序疏引尚書大傳註，孟子   | 葷鬻 | 史記晉灼      |
| 昆戎 | 史記               | 葷粥 | 史記匈奴列傳    |
| 犬夷 | 史記索隱引山海經         | 渾庾 | 魏志        |
| 犬戎 | 史記匈奴列傳           | 渾窳 | 史記匈奴列傳    |
| 吠夷 | 史記匈奴列傳           | 灌窳 | 賈子新書      |

## 二、匈奴的種屬

關於匈奴的種族問題，近數十年來，研究者逐漸增加。在前蘇聯及日本有許多學者從事相關研究。在歐洲有許多以英法文發表的文章、以德文進行的討論尤其多。不過研究此一問題的專篇論文仍少。歷來探討匈奴之種屬族別者雖多，而眾說紛云、莫衷一是，茲擇其要者分列如下：

### （一）匈奴與漢族同祖說

此處所謂「漢族」乃泛指華夏而言，按匈奴活躍於秦漢之際，時所謂「漢族」者，其名尚未成立，此處為行文方便，姑用漢族之名，持此說者係因《史記 匈奴列傳》載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sup>81</sup>

司馬遷之後研究匈奴問題之中國學者，多以史記為本，認定匈奴乃夏后氏之苗裔，只是對《史記 匈奴列傳》在解釋及取材上有所不同。

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產《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張晏認為夏亡後，淳維遷到北邊，成為匈奴的始祖，

<sup>81</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79。



不外是司馬遷「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之衍伸。但張晏提及司馬遷未載明的淳維北奔的年代，樂產則更進一步表明奔北野者為夏桀之子，且其名並非淳維而是獯粥。

《史記 五帝本紀第一》讚黃帝之功時稱：「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北逐葷粥，合符釜山，」司馬貞《史記索隱》於「葷粥」一詞曰：「匈奴別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稍加考察可發現司馬貞之謬誤：蓋司馬貞既同意樂產所謂獯粥為夏桀之子的理論，此處卻又載明唐虞以上已有熏粥，時間上這兩種獯粥相差約一千年，顯然自相矛盾。

清梁玉繩在其所撰《史記志疑》匈奴列傳條曾指出：「夫自闢天地即生戎狄，殷以前謂之獯鬻，周謂之玁狁，漢謂之匈奴。莫考其始，孰辨其類？相傳有所謂淳維者，難稽誰氏之出，未識何代之人。而史公既著其先世，復雜取經傳合併為一，無所區分，豈不誤哉。」可見，梁玉繩認為產生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於司馬遷對於匈奴的起源問題未作考證。司馬遷對於匈奴的起源問題，可能只是搜集當時的傳說及各種記載，充其量僅能反映當時漢族人對於這個問題的不同見解，而做為一種有系統的理論，則有待商榷。

中國史家或許基於熱愛華夏之心理，而往往喜將位於其邊疆各民族，強解為與諸夏同源共祖，卻失之於實證不足。巴克爾氏（Paker）於其所自著《匈奴史》中就此現象評曰：「中國史家論述邊徼諸國，政治起源，輒喜歸諸國中國流徙亡命之徒，以為此輩善於適應當地尚，重以知書識字，故易居高位，掌大權，而團結各民族乙成一國云云。」<sup>82</sup>

可見匈奴與漢族同祖之說，在無更多佐證支持前，以存疑為妥。

## （二）匈奴為突厥種說

採此說者多持語言之論據以為佐証，如雷膜薩特（Abel Remusat）、克拉普羅特（Klaproth）及馮家昇氏等。馮家昇氏舉「單于」、「撐犁孤塗」、「頭曼」、「冒頓」、「稽粥」、「骨都侯」、「祁連」、「焉支」、「徑路」九個名詞，與土耳其語系中之對音，而力倡此說：

「單于」：《漢書 匈奴傳》云：「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今土耳其語中之 Cagatai 語謂強盛廣大曰 Cong 或曰 Zengiz 與單于為對音。

<sup>82</sup> 巴克爾著，《匈奴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頁 2。

「撐犁孤塗」：漢書匈奴傳云：「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今土耳其語謂天曰 Tangri, Tengere, Tegri, Tangite, 此等字與撐犁為對音；又通古斯族中之 Barguzin 謂子曰 Guto, Yakuzk 為子曰 Kutu 與孤塗為對音。

「頭曼」：匈奴第一主也。土耳其語謂萬曰 Tumen, Tuman, 與頭曼為對音。

「冒頓」：匈奴第二主也。土耳其語頭曰 Bagtur, Batur, 與冒頓為對音。

「稽粥」：匈奴第三代主也。土耳其語謂二曰 Iki, 第二曰 Iki-nti 與稽粥為對音。

「骨都侯」：匈奴有左右骨都侯。今土耳其語謂威嚴幸運曰 Kutluk, 與之為對音。

「祁連」：漢書霍去病傳注云：「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土耳其語謂天有二種：一曰 Tangri, 表示最高之意，一曰 Kuklen, 表示蒼蒼者天之意。此 Kuklen 與祁連為對音。

「焉支」：《史記 匈奴列傳》亦作焉耆，亦作煙支。匈奴傳：「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今土耳其語謂新曰 Yangi, Kirgiz (按即吉爾吉斯) 語顏色曰 Ong, Uigurs (按即維吾爾) 語曰 Ongluk, Yakut 語曰 Ung, Cagatai 曰 Ung, 與焉支等為對音。

「徑路」：漢書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東土耳其斯坦語小刀曰 Ging-Rak, Telent-Turk 曰 Kyngy-rak 與徑路為對音。

馮家昇氏遂依據上列九個名詞，作如下論斷：「就以上諸語觀之，可知匈奴語與土耳其語語脈實相關聯，謂匈奴為土耳其系，誠不為過也。」<sup>83</sup>

然而馮家昇氏所引以為論証之依據者，僅得單于，撐犁孤塗，頭曼，冒頓，稽粥，骨都侯，祁連，焉支，徑路等九個名詞而已，其論據嫌薄弱，部分解釋亦嫌牽強乏說服力，如馮氏稱「稽粥」為「匈奴第三代主也」。又釋「土耳其語謂二曰 Iki, 第二曰 Iki-nti, 與稽粥為對音」。「稽粥」既為「匈奴第三代主」之意，又與「二或第二」為對音，無法解釋兩者間之關聯，難脫穿鑿附會之嫌。

再者，匈奴一詞之見於中國史冊者，早於秦漢之際已成定稱，若上接獫狁、鬼方、山戎、葷粥，則更可上溯黃帝時代，而突厥之名之見諸中國史書者，為時

<sup>83</sup> 馮家昇 匈奴民族及其文化，頁 641。

甚晚：魏晉之時，匈奴之勢已竭，而突厥尚未步入政治舞台，強將先有之民族歸於後起者之族屬，似有本末倒置之弊；吾人如指突厥為古匈奴之族，則可，如稱匈奴為突厥族，則不可。無怪巴克爾氏於其所撰《匈奴史》一書中稱：「後來屢用突厥人或突厥塞種（Turko-Scythian）之名以稱匈奴帝國中各同種部落；然在西元後第五世紀以前，猶無突厥之名，漫以此稱往昔匈奴，將不免通人之譏矣。」<sup>84</sup>

可見認定匈奴為突厥種者，在命題上已先犯了本末倒置之謬誤；此說之不確，毋需贅述。

### （三）匈奴為蒙古種說

所謂「蒙古種」有下列兩種意義，其一，乃指人種學上之「蒙古洛德」（Mongoloids），亦即習稱之所謂「黃種人」，則毫無意義，亦無深究之價值。其二，則指孛爾帖赤那與豁埃馬蘭勒所繁衍之蒙古民族而言，如是，則有加以深討之必要。<sup>85</sup>

主張匈奴族為蒙古種者，有帕拉氏（Pallas）、貝格曼（Bergmann）、史密德（J.J. Schmidt）、比楚林紐曼（Bischurin Neuman）、白鳥庫吉及王桐齡等中外學者，多推斷匈奴為蒙古族。

王桐齡氏於其所著《東洋史》一書中，認為匈奴為蒙古族與通古斯族之混合種<sup>86</sup>，至其所撰《中國民族史》一書，則直指「匈奴為蒙古族」<sup>87</sup>。近人周谷城氏亦於其所著《中國通史》一本稱「匈奴即蒙古族」<sup>88</sup>而近人趙尺子氏主張最力，趙氏於其所著《蒙古語文比較學舉隅》一書中，除稱：「蒙古為匈奴遺民，則蒙古語當然為匈奴語。」<sup>89</sup>外，並以《史記 匈奴列傳》所載匈奴詞彙，證明其與今之蒙古語相當，用以證明匈奴與蒙古同語同祖。<sup>90</sup>另近人姚鳳岐氏亦採此主張，姚氏於其所著《蒙古概況》一書稱：「夏之燻鬻，秦漢之匈奴，俱屬蒙古民族。」<sup>91</sup>

<sup>84</sup> 巴克爾著，《匈奴史》，頁 3。

<sup>85</sup> 劉學鈞《匈奴史論》，頁 16。

<sup>86</sup> 王桐齡《東洋史》，（台北：商務印書館，）頁 51-52。

<sup>87</sup> 王桐齡《中國民族史》，（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頁 75：「在戰國末年，有兩大部分。一部落在西方，以蒙古族為主要血統，史書上稱之曰匈奴。」

<sup>88</sup> 周谷城《中國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 293。

<sup>89</sup> 趙尺子《蒙古語文比較學舉隅》，（台北：中國邊疆語文研究會，1969年），頁 219。

<sup>90</sup> 趙尺子《蒙古語文比較學舉隅》，頁 92-140。

<sup>91</sup> 姚鳳岐《蒙古概況》，（出版地不詳，1954年），頁 1。

百餘年來，企圖將匈奴語解釋為蒙古語之各種嘗試，均屬徒勞，無一獲學術界承認。

按最後活動於政治舞台之匈奴民族為北涼沮渠氏，其滅亡於西元四三九年，此後匈奴之名，即不再見於中國史。劉學鈔氏於其所撰《蒙古源流考》一文中曰：「再後五六百年，始見蒙古之名，且在此五六百年間，鮮卑、蠕蠕、突厥等族，先後崛起於今內外蒙古一帶，如僅以居地相同而認定蒙古為匈奴後裔，如遽然認定蒙古為匈奴之後裔，實有言之尚早之感」<sup>92</sup>

蒙古尚難為匈奴之後裔，自不能與匈奴同祖；可見此說亦蹈以後起民族名早期民族之覆轍。

#### (四) 匈奴為芬族說

持此說者有馬丁 (Saint Martin)、謝美若夫 (Semenoff)、尤薩李維氏 (Uisalivis)、胡秋原氏諸人；胡氏於其所著《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一書中稱：「其實通觀歷史，蒙土二系，皆後起之混合民族。其後匈奴遷來，而北狄變為胡。今日芬蘭、匈牙利、愛沙尼亞以及薩摩、烏斯甲、愛斯塞摩，皆為芬族。而匈奴與芬蘭、匈牙利同種，殆已無甚問題。」<sup>93</sup>胡氏又於同書第六三六頁中稱：「關於匈奴究為何族，有東胡、蒙古、突厥、芬種四說，尚有俄人，竟有謂其為斯拉夫族者。我以為芬族之說為是。」<sup>94</sup>

指匈奴與芬蘭、匈牙利等同族，或較近於事實，不過仍缺乏任有力之論證，而匈奴之與匈牙利發生關聯，當係在東漢竇憲伐北匈奴後，北匈奴西徙，越烏拉山進入歐洲，建帝國與匈牙利之後，始與匈牙利發生關係，原匈牙利人與匈奴是否確有血胤上之關係，似仍有存疑之必要。

匈奴為芬族之說，尚有待更多進一步証據之支持，目前仍以存疑為妥。

#### (五) 匈奴為斯拉夫種說

主張匈奴為斯拉夫種者，皆為俄國人，如陰若氏特蘭且夫 (G. Inostrancev)，陰氏於其所著「匈奴與匈人」(Chunnu und Hunnen 1926, 2<sup>nd</sup> ed) 一書中，匯集

<sup>92</sup> 劉學鈔《蒙古源流考》《蒙古論叢》，(台北：金蘭圖書公司出版，1979年)，頁7。

<sup>93</sup> 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台北：學術出版社，1978年，第四版)，頁634。

<sup>94</sup> 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頁636。

各家之說，最後加以推斷，認定匈奴為斯拉夫人（Slavic）<sup>95</sup>。

按斷匈奴為漢族、突厥、蒙古、芬族諸說，或本於史傳所載、或出於語言有其相同者、或由於歷史延續、或由於地望相當，雖尚不能完全斷定，成為眾所公認之學說，然終究有所依據，至少尚能自圓其說，成一家之言；但匈奴為斯拉夫種之推論，則無絲毫根據可言，就人種學而言，匈奴屬黃種之「蒙古洛德」（Mongoloid）而斯拉夫族屬白種之「高加索德」（Caucasoids），皆為世所公認之事實，不同的人種，豈能成一族？此說之荒謬，由此可知。

綜觀以上有關匈奴源流之各種說法，除第五說「匈奴為斯拉夫種」荒誕不經，不足採信之外，其餘四說均各有其論據，卻又不足以使之完全成立，因此探討匈奴之源流時，似宜在漢族說、突厥說、蒙古說、芬族說之既有論據下，另闢途徑，以尋求更具說服力之說法。

在探討此更合理、更具說服力的說法前，吾人似需先瞭解一項事實，亦即探討某一民族之源流，不可先存有某族係某族後裔之定見，需知人類起源一元論或多元論，雖仍有爭執，但因近年來在不同地區原人化石之不斷發現，兼以現存人類在膚色、髮型、頭型、語言、面型、眼狀、各方面歧異程度觀之，顯然人類起源多元論，更能符合實際之需要，然而人類各民族在長久之歷史過程中，無論在語言、習俗乃至血緣等方面，極易受周圍各民族之影響，同時亦影響周圍各民族，更由於彼此互相通婚，在血統上彼此互相融合，亦為極自然之結果，以上諸種情形，在以游牧為生計類型之各種民族間，更易發生，吾人如不立足於人類起源多元論上，而僅憑某二個民族之一、二相同點，而輕予認定此二民族為同族，則未免過於草率。<sup>96</sup>

從既有之各項資料觀察，匈奴係游牧民族，當屬不爭之論，其機動性極大，因此與其他民族接觸之機會亦最多，亦因此，匈奴族無論在語言或習俗方面，或多或少均亦受到所接觸民族之影響，此亦當屬無可爭議之事實；關於匈奴的起源及種屬問題，誠如劉學鈔氏在其所撰《匈奴史論》一書中第一章匈奴源流所主張：「既早自皇帝時代已有葷粥，（見《史記 五帝本紀》有『黃帝，北逐葷粥』句），可見匈奴實與諸夏同屬源遠流長之民族，此殆無可置疑者也，而其後千餘年，在文化習俗上，一方面受周圍諸民族之影響，另一方面亦影響周圍諸民族，因此本書認為匈奴自匈奴，不必強其與某族共祖，或某族之後裔。」<sup>97</sup>

<sup>95</sup> 詳見馮家昇氏《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第二頁：「匈奴為斯拉夫種主張者皆為俄國學者，如 G. Inostrancev 所著之《匈奴與匈人》（Chunnu und Hunnen 1926, 2<sup>nd</sup> ed.）匯集各說，最後推斷為 Slavic 是也。」另胡秋原氏於其所著《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一書之第六三六頁：「關於匈奴究為何族，有東胡、蒙古、突厥、芬種四說，尚有俄人，竟有謂其為斯拉夫說者。」

<sup>96</sup> 劉學鈔《匈奴史論》，頁 23。

<sup>97</sup> 劉學鈔《匈奴史論》，頁 25。

## 第三節 匈奴早期的發展

在探討了匈奴的起源、族稱及種屬問題後，於正式探討漢代匈奴與中原民族和戰關係之前，擬就匈奴之早期事略加以研析，期對匈奴之早期歷史能有較深入的認識。此處所謂的「早期」，係指漢代以前之情勢。

### 一、匈奴與諸夏的和戰

由《史記索隱》對於「葷粥」一詞的記載<sup>98</sup>可知中國古書中所謂的戎、西戎或山戎者，實皆匈奴之前身，在殷商以至周初，名曰「鬼方」；如由《易 既濟 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看來，可以想見周初，匈奴前身的鬼方力量必定甚為強大，殷高宗因而需費三年以「克之」。

匈奴與華夏之關係，見於中國古書者，似以戰爭始，及至周時，周人稱匈奴為獫狁；匈、周之間仍時有戰爭，《漢書 匈奴傳》曰「周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戎，獫狁孔棘！』」

《漢書》所引《詩》，乃《詩 小雅》中之 采薇，詩之原文為：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啟居，獫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sup>98</sup> 司馬貞《史記 五帝本紀 索隱》卷1，頁7：「(葷粥，)匈奴別名也。唐虞以朝朝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  
豈不日戎，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sup>99</sup>

此詩係描寫匈奴犯周，使周人有「靡室靡家」之苦，可見當時匈奴給周人影響之大。

此外，《詩》六月、出車等，亦記述周宣王時，匈奴與周之戰事，漢書匈奴傳稱：「宣王興師命將，征伐獫狁，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號為中興」。<sup>100</sup>

按周宣王時當西元前八二七年至西元前七八二年，共在位四十六年，如設周宣王伐匈奴之事發生於宣王中葉，亦即在西元前八百零五年左右，匈奴力量已然相當龐大，否則何勞貴為天子之周宣王「興師命將，征伐獫狁」？同時戰爭面亦必然甚為寬廣，否則亦不致收入類似民歌性質之《詩》；《詩》，漢以後稱《詩經》，現存三五篇，另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僅「有其名」而「亡其辭」，其中除前述采芣、六月及出車三篇與匈奴有關者外，另有定之方中、載馳、清人及無衣等四篇，亦直接間接與匈奴有關，《詩經》早於《史記》，無待贅言，因此《詩》中有關匈奴之記載，實為彌足珍貴之史料。<sup>101</sup>

此後匈奴與周之間仍時有戰爭，至周幽王時，匈奴復五敗周師，據范曄《後漢書》云：「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sup>102</sup>，足證周幽王時戎勢大熾。

東周平王在位之五十一年間（西元前七七一年至西元前七二一年），匈奴（其時仍以犬戎、狄等名稱為世所知）對東周及諸夏之侵伐，記載較不明確，但《史記秦本紀》襄公時，曾載戎、西戎或犬戎有所接觸，《史記》稱：

「襄公元年<sup>103</sup>，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擊之，

<sup>99</sup> 宋海屏譯《詩經新譯》，頁16-20。

<sup>100</sup> 班固《漢書匈奴傳》卷94，頁。

<sup>101</sup> 劉學鈔《匈奴史論》，頁34。

<sup>102</sup> 范曄《後漢書西羌傳》卷87，頁2872。

<sup>103</sup> 周幽王五年、西元前七七七年。

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維雒，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秦襄公為諸侯，賜以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功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十二年<sup>104</sup>，伐戎而至岐，。」<sup>105</sup>

此為秦與匈奴有所接觸之明證；秦以地處西邊，近於匈奴，宜乎其時有接觸也。及至秦文公十二年<sup>106</sup>，秦復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秦文公招地至岐，其後接觸自是更為頻繁，而匈奴或其相關部族，分布地區，已擴大及於成周、魯、衛、燕、晉、趙、秦諸國矣！

茲為明瞭起見，將自春秋至秦漢之際，匈奴與諸夏之接觸或爭戰，將其較具規模者分別記敘如次：

（一）周襄王十五年（西元前六三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以為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葉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為慙乎？』，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党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犇鄭，鄭居王于汜，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此處翟人即狄人，亦即匈奴，或至少與匈奴有關者，不僅入於周，周襄王且曾以翟女為后。

（二）齊桓公二十三年（周惠王十四年、西元前六六三年），「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以齊之地觀望之，其所伐之山戎，當非後世與西羌有關之戎，而係與匈奴有關之戎，是證春秋初期，齊已與匈奴有戰爭發生。

（三）秦厲公共十六年（周貞定王八年、西元前四六一年），「灋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按大荔即大荔之戎，亦匈奴之屬。

（四）秦孝公元年（周顯王八年、西元前三六一年），初以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狄）遇之，至秦孝公時，布惠境內，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國勢乃強，遂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賓客群臣有能出奇

<sup>104</sup> 東周平王五年、西元前七六六年。

<sup>105</sup> 司馬遷《史記 秦本紀》，卷 5，頁 179。

<sup>106</sup> 東周平王十七年、西元前七五四年。



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所謂「戎、翟」亦與匈奴有關。

(五)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周赧王元年、西元三一一一年)，至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匈奴既參與諸夏之「聯軍」以攻秦，足證西元前三一一年左右，匈奴已與諸夏有相當來往，否則匈奴不可能參與聯軍。

(六)趙悼襄王元年(秦始皇三年、西元前二四四年)，趙悼襄王使李牧為將以備匈奴；李牧者趙守北邊之良將也，據《資治通鑑》載李牧事甚詳，曰：「李牧，嘗居帶、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組皆輸入莫(同幕)府，為士卒費，日擊牛饗士，習騎射，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亡失，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強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趕奉命。』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悉勒習戰，火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破東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進趙邊。」李牧此役多為奇陳，殺「匈奴十餘萬騎」，使匈奴元氣大傷。

(七)據《史記 秦始皇本紀》之記載，秦始皇帝三十二年(西元前二一五年)，秦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適盧生使入海還，因奉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秦始皇遂遣大將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其時所謂「亡秦者胡也。」出自錄圖書，其性質類於後世所謂讖諱之書，鄭玄《史記集解》對「亡秦者胡」作如是觀：「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sup>107</sup>

此時，匈奴當為頭曼單于之世，次年(西元前二一四年)，蒙恬逐匈奴，收河南地，設為四十四縣。

(八)戰國時，秦、趙、燕等國，為禦匈奴，紛築長城，《史記 匈奴列傳》載有：「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歲，趙襄子踰句注而被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

<sup>107</sup> 司馬遷《史記 秦始皇本紀》卷5，頁252-253。

「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

「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sup>108</sup>「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余匈奴。」

準上史料所敘，可知戰國之時，沿北邊之秦、趙、燕三國，與匈奴接觸必多，因此衝突自繁，遂有築城以禦胡之舉。

## 二、頭曼單于時期的匈奴

《史記 匈奴列傳》云：「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sup>108</sup>部分學者遂據此表示頭曼以前的匈奴歷史難於考察，而主張探討匈奴歷史，宜自頭曼談起。<sup>109</sup>

關於「頭曼」一詞的語源與意義，據大陸學者陳序經氏在其所撰《匈奴史稿》一書中曾引夏德的看法，謂「頭曼這個名字與突厥語的 Tumen 有密切關係，其意義是萬。」<sup>110</sup>陳序經氏並進一步解釋其意義：「假使頭曼的意義是萬，那麼也許是因為匈奴到了頭曼的時候，已經強大，而頭曼這個單于所統治的人民的數目比過去大大增加，而含有萬人或更多人的首領的意義，所以頭曼當為眾多廣大之貌。」<sup>111</sup>

土耳其著名的歷史學者厄格爾氏 (Bahaeddin Ogel) 在其所撰《突厥神話》中則採法國漢學家 Joseph De Guignes 之音譯，主張「冒頓之父，其名讀若 "Teo-man"。今日漢學界則解作 "T'ou-man"；顯然是上古突厥語中寫作 Tuman、今日土耳其語中所謂的 Duman (煙；煙雲；雲霧) 一字。古時候突厥人喜歡取名為 Tuman 因為煙霧具有即刻消散的特性，也就是說片刻間撥雲見日；以 Tuman 為名，其實意味著擺脫陰霾，迎接光明。」<sup>112</sup>

<sup>108</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0。

<sup>109</sup>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 153-154。

<sup>110</sup>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 154：「關於頭曼這個名字，外國學者也有很多討論。夏德在《阿提拉族譜考》一文中，相信頭曼這個名字與突厥語的 Tumen 有密切關係，其意義是萬。」

<sup>111</sup>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 155。

<sup>112</sup> Bahaeddin Ogel *Türk Mitolojisi* 《突厥神話》，p6, p235.

以上列出了關於「頭曼」一詞語源上的一些解釋。厄格爾氏則認為該詞源自今日土耳其語中意義為「煙」<sub>ك</sub>「煙雲」<sub>ك</sub>「煙霧」<sup>113</sup>之 duman。為了探究此說之正誤，筆者查閱一九九八年由土耳其語言學會編定，第九版的《土耳其語辭典》中關於 Tumen 一詞之釋義，發現其具有「群眾；眾集」<sub>ك</sub>「步隊編制中兵員介於旅部及團部間的單位」<sub>ك</sub>「一萬名兵卒所構成的編制單位」以及「萬」之意義，<sup>114</sup>顯然與 duman 一詞並無關連。

此外，執土耳其語語源學界牛耳之英國著名學者克勞森（Gerard Clauson）爵士於一九七二年寫成的《十三世紀之前土耳其語之語源學辭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sup>115</sup>就 tumen 一詞提出如下說明：

「宜作『萬』解，但亦常用以指極為龐大之數；布利卜連克教授（Prof. Pulleyblank）曾口頭上表示，他認為該詞可能借自初始的中文（Proto-Chinese）其型態類似 *tman*，也就是 *wan*（萬）這個字的趨型。<sup>116</sup>之後再傳入早期的蒙古文，寫作 *tume(n)*<sup>117</sup>，在波斯文則作 *tuman*，並傳入其他外國語，詳見 Doerfer 氏編纂之《Tu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新波斯文中之土耳其語及蒙古語因子》<sup>118</sup>第二冊頁九八三。某些現代語言中仍可見到該詞，但很可能是再從波斯文、蒙古文中借得。」<sup>119</sup>

經由上述專書的解說，可知學理上完全找不到任何足以證明 tumen 與 duman 二者有所關連的資料。是故筆者在此只能將厄格爾氏的說法界定為其個人見解。由於語源學為克勞森（Gerard Clauson）爵士之專業領域，顯然其關於「頭曼」（tumen）一詞的理論較令人信服。此外，今日土耳其文中 tumen 一詞「萬」的意義在日常生活中已相當罕用，僅軍事領域上之用法較為人所知。

根據陳序經氏參酌裴駟所撰《史記匈奴列傳集解》的記載所作的推論，頭曼可能在秦始皇統一中原前已立為單于。陳序經氏並進一步推論《史記卷八十一李牧傳》所記載的為李牧攻破而北徙的匈奴單于，可能就是頭曼。<sup>120</sup>台灣學者劉學鈔氏亦於其所撰《匈奴史論》一書中如此推測：「其時匈奴之單于若非頭曼，

<sup>113</sup> 黃啟輝《土漢辭典 Turkce-Cince Sozluk》（台北：政大東方語文學系，1998），頁 109：「duman: 煙、煙雲、煙霧」<sub>ك</sub>

<sup>114</sup> Turk Dil Kurumu(TDK；土耳其語言學會)編纂 *Turkce Sozluk*《土耳其語辭典》，Ankara: Turk Dil Kurumu Basimevi, 1998, 9. basim, p2264.

<sup>115</sup>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1972.

<sup>116</sup> H.A. Gile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1912, p12486.

<sup>117</sup> Prof. Erich Haenish *Worterbuch zu Manghol un Ni'uca Tobca'an*, Leipzig: 1939, p154.

<sup>118</sup> Prof. G. Doerfer *Tu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Wiesbaden: 1963, 1965, 1967.

<sup>119</sup>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p507.

<sup>120</sup>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 154。

或當為頭曼之父，蓋其下距頭曼單于之死年，僅四十三年也，」<sup>121</sup>

關於頭曼時代匈奴與月氏的勢力消漲，陳序經氏主張：「至於月氏，在頭曼的時代，也很強盛，從《史記 匈奴列傳》指出頭曼遣太子冒頓質於月氏的記載中還可以推想到當時月氏與匈奴的關係。在我國古代以子或貴族為質，至少有二種情況。一為兩個力量相當的國家，無論那一方都怕對方侵伐，因而互派其子或貴族為質；一為弱國怕強國的攻擊，遣子或貴族為質。我們難於判定匈奴頭曼之遣冒頓質於月氏，是屬於哪一種。據《史記 匈奴列傳》說，月氏是強盛的，那麼匈奴在這個時候假使不是弱於月氏，必與月氏同樣強盛，成為敵對的國家。史書沒有記載頭曼攻擊月氏的結果如何，但是月氏欲殺冒頓，冒頓卻盜其善馬而歸。頭曼欲借月氏殺冒頓的計畫失敗，可能也就罷兵。至於月氏被匈奴攻擊，同時質子又逃跑，假使月氏比匈奴強盛，月氏不僅要追回質子，而且定要出兵進攻匈奴。事實是匈奴這一次未受到月氏反攻，說明匈奴在這個時候，已經強大起來了。」<sup>122</sup>

至李牧死後，秦忙於併吞六國；中原各國亦忙於征伐與對抗強秦。匈奴因經過十多年的休養生息，便趁中原內戰之時機，南下攻打農業民族。蓋此時匈奴之北為森林地帶，於游牧不宜，月氏與東胡仍強盛，農耕地區以其富饒，兼以忙於內戰，而予頭曼襲擊、掠奪之良機。

《史記 匈奴列傳》載有：「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sup>123</sup>可知蒙恬北逐匈奴，頭曼難以抵擋而北徙了十餘年。

### 三、冒頓單于時期的匈奴

頭曼的時代，匈奴已經強大；然而由《史記 匈奴列傳》中「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的記載，可知匈奴最強大的時期，是在冒頓即單于位之後。

冒頓於西元前二 九年，亦即漢肇建前三年，殺父（頭曼）自立，至漢文帝六年（西元前一七四年）辭世，計在位三十五年，歷與秦二世胡亥，漢高祖、惠帝、呂后、文帝等君主交涉，並征服了西域許多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sup>124</sup>可見冒頓統治時期，匈

<sup>121</sup> 劉學鈞《匈奴史論》，頁 38，40。

<sup>122</sup>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 156-7。

<sup>123</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87-2888。

<sup>124</sup>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6。

奴之強盛，空前絕後。

中外許多學者對於冒頓一詞的語源及意義，作了許多考證。如德格羅特在《紀元前的匈奴》一書中將之譯為 Mortur。而巴克的《韃靼千年史》與夏德的《阿提拉族譜考》均作 Bagdur。<sup>125</sup>

土耳其歷史學者厄格爾 (B. Ogel) 在其所撰《突厥神話》中就「冒頓」一詞說明如下：「土耳其歷史學者於翻譯中國史書上之『冒頓』一詞時皆因襲法國漢學家 Joseph De Guignes 之音譯 (Mei-dei; Mei-tei) 而採取 *Mete* 之形式拼寫。是故，土耳其史書上統一拼寫作 *Mete*。然而我認為冒頓時期該詞應讀作 Bak-tut。由於中國人發不出字尾的“r”音，而將之轉為“t”音；*Mete* 一詞在上古突厥語中應作“*Bagatur*”，中古突厥語則作“*Bahadir*”。以上推論是德國漢學家 F. Hirth 的創見。」<sup>126</sup>

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在其所撰《蒙古民族起源考》一文中對「冒頓」一詞之語源及意義提出如下解釋：

「匈奴謂建國家之王曰冒頓，冒頓現讀若 Mou-tun，《史記 匈奴列傳 索隱》載冒音墨，又作如字，《前漢書》注云：『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故冒頓之古音似若 Mok-duk 或 Bok-du (Mok-dok, Bok-dok)，若根據現音之 Mantun 而求其語源，則可與滿州語威勢權力之義之 Muden，及榮盛之義之 Mukden，互為比較，但如有正確之古音，則可據而探求之，此至當之辦法也。因此，余視 Bokdok 為冒頓(古音墨毒)之古音，以為蒙古語譯義曰 Bogda (Bogdo) 之譯，Kowalewski 氏《蒙古字典》(1212)釋 Bogda 為 Saint, Divin, Venerable, Reverend, Seigneur, Miatre, title de grands personages。故解為帝王之稱號，至為適當。成吉思汗之尊號又稱 Sotto, bagdo cingiz 故冒頓單于正同 Bogdo ciniz 一語。夏德於其所著《阿提拉族譜考》(Die Ahnentafel Attilas nach Johannes von Thurocz) 中大部分之工作，均費於解釋冒頓之二字，而謂係蒙古語釋義，曰猛勇之 Boghatur 之音譯。」<sup>127</sup>

由於冒頓的豐功偉業，而推論「冒頓」一詞表勇猛之義，固然言之成理；然而在匈奴的許多單于之中，僅頭曼、冒頓及屠耆三個名字能釋其義，其他單于的名字意義如何，則不太清楚，究竟是因為其他單于的名字尚未探究出其意義，抑或是所有單于的名字本來就沒有意義，仍有待研究。此外，已知意義的單于名字當中，除屠耆的意義是賢之外，頭曼、冒頓是否因其發音與後來的它種語言相近

<sup>125</sup>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 165。

<sup>126</sup> Bahaeddin Ogel *Türk Mitolojisi*, p5.

<sup>127</sup>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 166。

而得釋義，亦有待學者專家繼續探討。

由於冒頓單于時期匈奴的情勢發展，已進入漢代，不屬於本節所界定的「早期」範圍，本論文將於第三章詳加探討，故此處不多作論述。

冒頓是一位異常能幹而活動力強的領袖，因此在短短數年之間，他不但造成了各個匈奴部落間前所未見的內部團結，並且對外擴張。向東，冒頓擊敗了位於蒙古東部、滿洲西部，強而有力的東胡；這群人在冒頓崛起後，曾壓迫過匈奴。向西，他在軍事上成功地打擊了甘肅走廊的月氏；這些人是匈奴的世仇，冒頓曾被他的父親派到月氏做人質。向北，他征服了一些游牧民族，包括西伯利亞南邊的丁零。向南，由於秦在鄂爾多斯的防衛系統崩解，冒頓得以收復以往蒙恬奪去的土地。在這廣大的新領土上，冒頓將位於和碩柴達木的龍城，建立成匈奴一年一度的集會所在；龍城作為匈奴聯盟的京城，所有重要的宗教和政府事務都在那裡集中管理。每年秋天在龍城附近舉行一次匈奴群眾大會，同時進行人口及牲口的普查。也是在冒頓的領導之下，匈奴聯盟開始出現一個比較成熟的政治組織形態。<sup>128</sup>

---

<sup>128</sup> 垂齊特，費班克《劍橋中國史（二）》，（台北：南天，1987年），頁443-444。